

陈垣

来往书信集

—增订本—

陈智超 编注

陈垣（1880—1971），字援庵，著名京师范大学校长。这部来往书信集汇集了伯希和、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二百余往书信，是了解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学术史的。陈垣的许多家书为首次发表，信中多有修身的内容。作为教育家的陈垣，这些家书全部往来书信共2100余通。

陈垣

来往书信集

—增订本—

陈智超 编注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0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陈垣来往书信集/陈智超编注. —增订本.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11

ISBN 978-7-108-03498-4

I. ①陈… II. ①陈… III. ①陈垣 (1880~1971) —
书信集 IV. ①K825.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7652 号

责任编辑 曾 诚

封面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卢 岳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75.75

字 数 1,152 千字 图片 28 幅

印 数 0,001—4,000 册

定 价 118.00 元



一九一三年三月，当选众议院议员时留影



一九二八年五月



一九四二年四月，在辅仁大学返校节运动会上演讲



一九六二年七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门前

总目

增订本前言 陈智超
——兼论书信的利用与整理 1

初版前言 陈智超 11

书信目次 17

凡例 24

来往书信 25

家书 929

陈垣简谱 1191

通信者索引 1201

图版 1209

增订本前言

——兼论书信的利用与整理

陈智超

—

《陈垣来往书信集》1990年出版，至今已经有二十年了。在当今这个飞速变化发展的社会，对于一本书的生命力来说，二十年可以算是中考了。《书信集》销售、阅读、引用的情况，说明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通过了中考。《书信集》初版印了两千册，不久就脱销，以致许多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来索取。起先我还能从出版社给我的样书中取出来应对。后来实在无法应对，一位安徽大学的教授恳切要求从我保留的两三册样书中借阅一册。几年后，当我们再次见面时，他很抱歉地拿回那已经被他翻破的书来还我。有此知音，我当然慨然相赠。在图书馆中此书被翻残的情况，我也时有所闻。无处购买，复印《书信集》全书的消息也不时传来。我在1985年为《书信集》写的前言中曾经说过，这部书信集为研究援庵先生提供了一份极其宝贵的材料，为了解和研究近现代中国学术、特别是史学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材料，它也是近五十年中国社会这个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珠。实际情况证明了这个判断。近二十年来，凡是研究援庵先生这位世界级学者，凡是研究近现代中国史学，所有有分量的著作，无不引用《书信集》。作为编注者，看到上述情况，感到非常欣慰。但是，阅读、引用者多而一书难求，又使我深为不安。这就是二十年后本书要出增订本的第一个原因。

出版增订本的第二个原因，是二十年来读者和我自己发现了本书整理工作中一些需要改正或补充的地方。相识或不相识的读者，或在报刊上发

表文章，或在来信或电话中指出这些问题。例如周一良先生就告诉我一些信中提及的人物的名字和情况，指出谭祖任的来信指明了现在闻名京城的“谭家菜”的源头。有些文章指出某些信件的编年有误。我自己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所有这些，我都在增订本中加以改正。

更重要的是，在这二十年中，我又发现了大批可以补充的书信，其中有些非常宝贵。例如援庵先生与家叔约之先生自1927年至1969年四十二年间的家书，现藏巴黎吉美博物馆的援庵先生致伯希和的信件等。

可能会有人提出疑问：即将出版的《陈垣全集》也收入书信，与《书信集》是否重复？我的回答是：第一，《陈垣全集》整套出售，书信部分不能单独购买。第二，更重要的是，按照《全集》的体例，它只收援庵先生本人的著作，因此书信部分也只收援庵先生致他人的信件，不收他人的来信。所以《书信集》增订本仍有出版的必要。

《书信集》初版计收援庵先生致他人书信375封，他人来信892封，共计1267封。经过近二十年的收集，新增援庵先生致他人书信467封，他人来信180封，另有援庵先生批复家书125封，共计2039封。那些批复信，实际上包含了一来一往的两封信，照此计算，增订本共收援庵先生致他人信967封（为初版的258%），他人来信1197封（为初版的134%），共计2164封（为初版的171%）。《书信集》增订本收录了经过整理的援庵先生这样一位大学者、大教育家自1913年至1969年五十六年间来往书信2164封，如此规模在书信集中是罕见的。

除了《陈垣来往书信集》外，二十多年来，我还编注、整理过几大批书信。它们是1994年出版的《旅日高僧东皋心越诗文集》中的书信部分（118封），1995年出版的《旅日高僧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117封），2001年出版的《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733封信及190件名刺）和2002年出版的《钱镜塘藏明代名人尺牍》（407封）。总计我曾经整理的自明代前期至上世纪60年代的书信达三千五百多封。在这个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经验教训，愿借此机会奉献给读者。

二

关于书信的利用。

我们所接触到的书信，大致可分三种情况。最常见的是它的文本，也就是它的释文。这类书信有文献价值或史料价值。第二种是书信的影印件。它除有上述史料价值外，如果作者书法有一定水平，还有艺术价值和认识价值。第三种是书信原件，除上述史料价值、艺术价值外，还有文物价值。

我在这里要讨论的是书信的史料价值及其利用。一封或一组书信的史料价值，是由它所包含的信息量和信息的重要性决定的。发掘并利用书信的价值，一般要经过一个过程。我把这个过程区分为初次利用和二次利用两个阶段。

所谓初次利用，就是基础性的利用。一定规模的书信，可以编次结集，进一步还可以作出提要。如果没有条件结集，也可以编出目录、索引，为使用者提供线索。我所编的几部书信集，包括本书的初版、《隐元中土来往书信集》和《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七百通考释》，都为进一步利用、研究这些书信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和坚实的基础。

所谓二次利用就是利用书信于具体问题的研究。

书信首先是人际交流的重要手段。在电报、电话、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出现以前，更是除了当面对话之外，人际交流的唯一手段。因此，它是研究人际关系极重要的资料。我写的《史学二陈的友谊与学术》和《陈垣与胡适》两篇长文（均收入《陈智超自选集》，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充分利用了他们之间二十多年的往来书信。明代徽州方用彬亲友手札，更因其数量庞大，交往人物众多，展现出明代嘉靖、隆庆、万历年间丰富多彩的社会相。

对于写信人或收信人来说，书信也是他们的传记材料，或者说，可以利用书信研究书信来往者的生平。如果有关书信达到一定数量，或者内容特别重要，更是重要的传记材料。援庵先生没有记日记的习惯，他的来往书信就成为他最重要的传记材料之一。他的几百通家书，更为人们全面了解、研究他的生平、学术、教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有些书信虽然数量不多，但因其牵涉问题的重要而有特别的价值。例如，清初临济、曹洞两派的矛盾斗争是中国佛教禅宗史的一件大事，影响及于日本。现在保存在日本宇治市万福寺的临济宗费隐通容给他弟子隐元隆琦的一封信，以及保存在日本水户市祇园寺的日本曹洞宗诸僧给东皋心越的几封信，是我们研究济洞之争及其在日本的影响的重要资料。（参见《济洞之争在日本》一文，收入《陈智超自选集》）

书信作为一种重要史料的价值已经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认识，要在善于发掘和利用。

三

我在《自选集》的自序中写过如下一段话：“新史料的发现，史料真伪的判断及时代的确定，史料意义的多角度、多层次的诠释，以及发现和纠正文献在转录或刊刻过程中发生的无意及有意之误：这些是历史文献学的主要内容。”书信也是历史文献的一种，它和其他种类的历史文献有共性，上述内容对于书信的发掘、辨伪、整理、校订工作也是适用的。书信又有它自身的特点，所以书信的发掘、辨伪、整理、校订工作也有它的特点，有需要侧重的方面。

第一，关于新的书信材料的发掘

可以分为四种情况：

一、从未著录，也不为人所知，首次发现。

二、虽已公布，但收入法帖、书法作品集中，作为书法艺术品，首次从史料的角度加以利用。

三、虽为人所知，但被误判，首先加以纠正。下文还要详述的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明代七百馀通手札就是一例。

四、虽为人所知，首先加以利用，或首先从新的角度利用。

第二，关于书信真伪的判断

鉴定历史文献真伪的三个要素是：载体、笔迹（对刻本来说就是字体）和内容。现在流传下来的古籍，有些是伪书，即假托某一名人或前代的作品。这些伪书，如果能确定它作伪的时代，可以作为研究作伪者或作伪时代的资料。伪作的书信则是另一种情况。两年前，我曾从一位收藏者

的手中看到一封援庵先生致君豪（黄元蔚）的信件，过去从未报道过。从笔迹、信笺可以确认这是原信。但不久之后，我从一份拍卖图录中看到另一件内容完全相同的书信。显然这是伪作，内容则是作伪者直接或间接从原信抄录的。这样的赝品只会误导他人。这个事例提醒人们，随着收藏名人手札的风气日盛，伪作也应运而生。收藏鉴赏者应提高警惕。就援庵先生来说，他在各个时期的墨迹不少已影印公布，我和曾庆瑛教授还编了一本《陈垣先生遗墨》（岭南出版社 2006 年出版），可作为鉴定他的笔迹的依据。

第三，关于书信的整理

我把书信的整理工作概括为“五认”或“五释”。

一、认字，作出释文。

在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出现以前，中国人写信，除了极少数（一般是机关）使用打字机以外，绝大多数都用手写。由于写信人文化水平有高低、性格有差异、场合有不同，各人的笔迹千差万别。我所见的书信，工楷极少，大多是行书、行草，有的还不规范。而现在的中青年，相当一部分习惯使用电脑，辨认书信有困难，因此，正确认出书信的字迹，作出释文，是整理、利用书信的基础。我在作书信释文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量将书信影印件附在文中或书后，一是可以使读者对比阅读，增加亲切感受；另一方面，也是便于读者发现并指出我在“认字”过程中难免出现的少数错误。我认为这是对读者应负的责任。

二、认人，即确定写信人、收信人和信中提及的人。

三、认时，即确定写信时间和收信时间。

四、认地，即确定写信地点及收信地点。

后三项工作可视为一组，因为认人、认时、认地三项工作是紧密相连的。他们指明了书信的主体及其活动的时空范围。

下面举几个认人、认时、认地的实例。

一般来说，每一封信都有上下款，所以写信人、收信人以及信中提及的人究竟是谁，在“认字”阶段就可以解决。但实际情况比较复杂。首先是因为建国以前写信一般都不能直称收信人的名，只能称字、号。信中提及的人一般也称字、号，甚至是只有写、收信人知道的别号。其次是写信

人落款一般只署名而不著姓，稍为潦草或有特别写法就不易辨认。写信人的姓名有的署在信封上，或双方心照不宣，信文落款处写上“名正肃”、“名单具”、“名心渤”等字样，如信封没有同时留存，单凭信文要确定写信人就有难度。

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明代手札七百餘通，在我阅读、研究、考释之前，已有专文介绍。但因为该文作者误判了收信人，所以整批信件不能得到利用。原来，这批信件的收信人基本上是同一人，从上款可知，他姓方，字号为元素、黟江等。该文作者明确说收信人是明万历年间兰溪人方太古。方太古确实字元素，这从工具书中可以查到。但作者并没有细查方太古的生平，也没有认真查阅这批书信的内容，更没有将这两者结合起来考察，也没有设想过同姓同字号的人出现的可能性，作出了错误的判断。事实是，方太古生于成化七年（1471年），卒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根本没有活到万历年间。而这批信件中有绝对年代可考的，最早一封也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即在方太古卒后十七年，最晚的更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因此可以肯定收信人绝不可能是该文作者判定的方太古。但否定了方太古并不等于就可以轻易找到真实的收信人。茫茫人海，收信人何处寻？同解决其他历史问题一样，我们只能从已经掌握的事实出发。这就是这批信件本身，以及四百多写信人的名单。我从信件内容锁定了收信人是徽州歙县岩镇人。根据写信人汪道昆、胡应麟、方弘静等人的文集，以及徽州的地方志、歙县环岩《方氏族谱》、《十百斋书画录》等多种文献，与信件内容相印证，终于确定收信人为方用彬。他字元素，号黟江，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徽商家庭。他是汪道昆的学生，通过捐纳取得监生资格，至北京入太学。屡试不中，于是经商，但同各地文人保持广泛的联系，可称儒商。他卒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收信人确定以后，这批信件的进一步解读并为人们所利用才有可能。

授庵先生也写过一些考释清人信札的文章，包括他最后一篇学术论文《两封无名字无年月的信》。该文写定于1965年12月，当时他已是八十五岁高龄。原来他有一本汤金钊藏各家尺牍，其中有两封书信，没有上下款，有日无年月。虽无上款，但收信人无疑就是汤金钊本人。写信人笔迹

虽似王杰，但无确证。第一封信全文只有五十七个字，援庵先生根据信中提到“敝省蒙恩缓征之项，再予缓征”的“上谕”，在遍查《东华录》、实录不见之后，终于从《十朝圣训》中找到这通嘉庆七年五月戊子的上谕，从而认定信中的“敝省”为陕西，写信人是当时陕西京官首席王杰，写信时间就是上谕发出的第二天嘉庆七年五月二十日（己丑）。

第三个例子是考证收信人和写、收信地点的。钱镜塘旧藏明代名人手札中有耿定向致友人书信一封，无上款，信末署作时为“己巳仲冬廿一日”。《明史》卷221有《耿定向传》。耿字在伦，麻城（今属湖北）人，嘉靖三年（1524年）生，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卒。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六十年一甲子，耿定向一生中只经历过隆庆三年（1569年）一个己巳年，可以确定这封信作于隆庆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庚午（1569年12月28日）。此时耿定向因忤高拱，自大理寺右丞谪横州（今广西横县）判官。信中说“余年来块处深山”，知耿此信写于横州。收信人是谁呢？信中提到，“顷日杨道南来，询知贤近进修益力”；又说“吴中得春台倡导，闾里浸浸兴起”；又说“近见春台所编《守令宝鉴》，颇多愜余意”。杨道南名希淳，吴县（今江苏苏州）人，耿的得意门生。杨此时从苏州到横州探视老师，谈及家乡情况，可知收信人当时在苏州。信中称收信人为“春台”，又称赞他所编的《守令宝鉴》。《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传记类存目有《守令懿范》四卷，为蔡国熙任苏州府知府时辑古来守令事迹所撰。《守令懿范》与信中提到的《守令宝鉴》应是同一书。由此可以确定，此信的收信人是时为苏州知府的蔡国熙。信中又说：“偶柳塘有使来省刚峰，附此一致区区。”柳塘的姓名没有查到，但刚峰为海瑞，此时谢病回琼山（今属海南），可知耿定向是借柳塘探视海瑞的使者自琼山回程之便带信给蔡国熙的。从这个例子也可以了解到，当时异地通信并非易事，因此它的信息量是比较高的。

即使是现代书信，要确定它的时间，了解它的内容，有些也有相当难度。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了《陈寅恪集·书信集》，最近拟修订再版。集中有一封寅恪先生致傅斯年先生信，信末具时为“三十一日”，无年无月。编者定年为1929年，未能确定月份。责任编辑孙晓林女士曾同我讨论此信的具体作时。几经研究，最后才确定为1月31日。论证的过程是这样

的。信中说：“援庵先生函附上，乞察阅。其所拟办法，想无不可行，因敦煌组非援庵担任不可。”要确定此信作时和进一步解读此信，就要找到此信所指的“援庵先生函”。我确认，它就是与此信同藏于台湾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档案中的援庵先生致寅恪、半农（刘复）函。因为此函开头说，“承示傅先生十二月十四日函，敬悉一切。敦皇经卷之最难整理者莫过于首尾不完、失去标题之卷。”然后谈到，历史语言研究所要研究敦煌经卷，最好先将方家胡同图书馆（即北京图书馆前身之京师图书馆。援庵先生1922年春曾任馆长）所藏八千六百卷敦煌经卷目录刊布。自己曾费数月之力，按日将这批经卷逐卷翻阅一过，编成《敦煌劫余录》。“如果历史研究所需弟担任此事，可将弟所辑《敦煌劫余录》加以整理，用中央研究院名义出版。至傅先生所示办法三项，暂时月三百元亦足。现拟从二月起，继续校录无名经卷，经费请按月直接汇至弟处（翊教寺二号）。”此函未署“一月三十日”。再加上本书初版所收寅恪先生三月一日致援庵先生第十一函：“顷接傅斯年君电云，‘援庵先生件，院核准’等语，谨以奉闻。”整个事件的各个环节都可以衔接起来了：1928年，傅斯年在广州建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拟成立敦煌组研究敦煌文书，并因寅恪先生建议，请援庵先生负责敦煌组，出版《敦煌劫余录》。1928年12月14日，傅有信给在北平的陈寅恪、刘复两位，请他们将此意转达援庵先生（此函不存）。1929年1月30日，援庵先生致信陈、刘，表示同意。因为三人同在北平，所以第二天（1月31日），寅恪先生即将援庵先生函转致傅斯年先生，并表示同意援庵先生的方案。同年3月1日，寅恪先生致函援庵先生，告知中央研究院已核准此方案。1931年，《敦煌劫余录》由中央研究院出版。上面提到的寅恪先生1929年3月1日致援庵先生函，本书初版未能确定年份及“援庵先生件”所指，由此也得到了解答。

五、认事（释事），也就是解读书信的内容。这已属于诠释的范畴。诠释有不同层次，下面举一个多层次诠释的例子。

前述明代徽州方氏亲友手札中，有一封全文只有三十七个字的短信：“小编烦兄命人印一百部。每本该纸价、工价若干，一一奉上，但求速耳。侍生丘齐云拜。元素兄丈。”此信字迹清晰，没有“认字”方面的困难。上下款清楚，没有“认人”的问题。信的内容也很明白，写信人丘齐云请收

信人方用彬（元素）替他找人印他的“小编”，承诺负担纸值、工值，要求尽快印好。但这只是第一层意义。现在进而诠释它的第二层意义。我们已经知道收信人方用彬是徽州府歙县人，丘齐云找方印书，说明徽州印书业的发达。如果我们要进而发掘它的第三层意义，就要弄清楚丘齐云是什么人，他要印的是什么书？丘齐云字谦之，湖广麻城（今属湖北）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历任四川富顺知县、户部郎、广东潮州、四川保宁知府，三十八岁即致仕，与王世贞、汪道昆、吴国伦、欧大任等人交游。汪道昆为他写了墓志铭，陈田《明诗纪事》、民国《麻城县志》有他的小传。信中“小编”是丘齐云对自己作品的谦称。他的著作经著录的有《吾兼亭集》、《粤中稿》、《南北游草》、《楚丘集》、《度辽集》等。如果他要方用彬代印的书是以上著作中的一种，应称小集、小稿或小草而不是“小编”。后来我在朱孟震《游宦馀谈》、潘之恒《亘史》和钱谦益《列朝诗集》中，知道丘齐云编有《遥集编》，因此可以确定信中所称的“小编”就是《遥集编》。这样我们就可以诠释它的第四层意义：《遥集编》究竟包含了什么内容，丘编印《遥集编》说明了什么问题？《遥集编》的单行本虽然没有留存，但潘之恒《亘史》收录的《遥集编》及其序跋，应该就是它的全部内容，至少也是它的主要内容。从《亘史》所录《遥集编》谢陞序和李素素跋可知，丘齐云于万历十五年（1587年）携《遥集编》稿至徽州，此信应作于万历十五年的徽州，此编也应印于此时此地。《遥集编》是丘齐云和妓女呼文如唱和的诗集。钱谦益《列朝诗集》闰集收录了《遥集编》中呼文如的诗作，并为呼作一小传。从丘齐云《遥集编》序和呼文如小传可知，文如字祖，江夏营妓，知诗词，善琴，能画。丘、呼两人相识、定情于万历四年（1576年）。当时丘由户部郎出知广东潮州府，途经黄州（今属湖北）时遇呼，一见钟情。丘欲携呼至粤，为父所阻。以后两人几度离聚，终于在万历十年冬结合。从《遥集编》的编印以及众多文人的赠言可知，士大夫与妓女的交往唱和，被视为风流韵事，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诠释至此，似可结束，但我认为还可更进一步。《列朝诗集》闰集所收的是妇女诗作，钱谦益委托柳如是加以选编、评论。柳如是对呼文如的诗评价颇高，选录了她的二十一首诗，而仅收丘齐云一诗作为附录。我们有理由推断，这同柳如是有与呼文如相似的身世有关。